

家庭生态理论视角下随迁农民工家庭亲子冲突分析与介入框架建构

邓立威, 吴泳琛, 郑子洋, 胡奕纯

东莞理工学院法律与社会工作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广东 东莞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9日

摘要

随迁农民工家庭是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下形成的重要社会单元, 其亲子冲突因叠加城乡文化落差、父母高负荷工作、社会支持薄弱等多重压力而呈现出频次高、强度大、成因复杂的特点。现有研究多聚焦城市家庭与农村留守儿童, 对处于中间地带的随迁家庭关注不足, 且多以单一系统切入, 缺乏整体性的生态视角。本文以家庭生态理论为分析框架, 将随迁农民工家庭视为受微观、中观、外层、宏观及时间系统交互影响的动态生态系统, 采用文本分析与理论分析的方法, 剖析其亲子冲突的表现形态与生成机制, 揭示冲突是多层系统耦合与传导的结果。在此基础上, 从微观家庭赋能、中观系统联动、外层资源链接、宏观环境优化、时间维度跟进五个层面建构多层级的社会工作介入框架, 并阐明各层面所对应的社工角色与专业依据。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将家庭生态理论的系统互动与时间动态命题引入随迁家庭亲子冲突研究, 提供一个兼具整合性与可操作性的分析介入框架, 可为后续实证研究与实务干预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

随迁农民工家庭, 亲子冲突, 家庭生态理论, 社会工作介入

A Family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Analysis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in Migrant Worker Famil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vention Framework

Liwei Deng, Yongchen Wu, Ziyang Zheng, Yichun Hu

School of Law and Social Work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Guangdong

Received: September 8, 2026; accepted: October 16,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9, 2026

文章引用: 邓立威, 吴泳琛, 郑子洋, 胡奕纯. 家庭生态理论视角下随迁农民工家庭亲子冲突分析与介入框架建构[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10): 468-477. DOI: 10.12677/ass.2026.1510861

Abstract

Rural migrant families have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social unit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ization of population mobility in China. Parent-child conflict in such families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frequency, high intensity, and complex causes, shaped by the compounding pressures of urban-rural cultural disparities, parents' heavy workloads, and weak social support. Existing research has focused predominantly on urban families and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paying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rural migrant families situated in between, and has tended to adopt a single-system approach that lacks a holistic ecological perspective. Drawing on family ecosystem theory as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ceptualizes rural migrant families as dynamic ecosystems shap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micro-, meso-, exo-, macro-, and chrono-systems. Employing textual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anifestations and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in rural migrant families, revealing that such conflict does not stem from any single factor but results from the coupling and transmission of multiple system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leve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framework encompassing micro-level family empowerment, meso-level system linkage, exo-level resource connection, macro-level environmental optimization, and chrono-level follow-up, and elaborates the corresponding social work roles and professional rationale at each level.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introducing the system-interaction and temporal-dynamics propositions of family ecosystem theory into the study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in rural migrant families, thereby offering an integrative and operationalizable analytical-intervention framework that can serve a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futur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ntervention.

Keywords

Rural Migrant Families, Parent-Child Conflict, Family Ecosystem Theory,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6.16%，较 1978 年上升约 50 个百分点[1]。在这一进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经历了从单身外出到举家迁徙的形态转变，流动人口家庭化日益成为人口迁移的显著特征。与早期父母单方外出、子女留居农村的留守家庭不同，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携子女共同迁入城市生活，由此形成了随迁农民工家庭这一相对特殊的社会单元。

空间迁徙在带来经济机会的同时，也重构了家庭的生存环境：随迁家庭既要面对就业限制、经济压力、教育资源不均、社会融入困难等外部约束，又要在家庭内部应对城乡文化价值观念的碰撞。这种双重压力在亲子关系层面集中显现，与城市原生家庭相比，随迁家庭的亲子冲突呈现出频次高、强度大、成因复杂的特点，且往往因父母工作投入与子女情感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持续累积。亲子冲突不仅制约青少年的学业发展与心理健康，还可能经由家庭功能的弱化向外传导，成为影响社会整体发展的潜在因素，因而剖析其成因、探索有效干预路径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虽然现有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积累,但对随迁家庭这一特定对象的亲子冲突仍缺乏系统的生态视角考察,为本文留下了可推进的空间。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家庭生态理论为分析视角,采用文本分析与理论分析的方法,系统剖析随迁农民工家庭亲子冲突的表现形态与生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多层级的社会工作介入框架,为该群体的家庭服务实践与后续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参照。

1.2. 文献综述

1.2.1. 亲子关系与亲子冲突的相关研究

亲子关系是个体最早建立、影响最为深远的人际关系,历来是家庭研究的核心议题。已有研究大体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关注亲子关系的影响因素:曹瑞基于全国 5316 名小学生的调查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亲子沟通越频繁、越倾向于说服而非强制[2];杨莉则指出健康的亲子关系应以夫妻关系为核心,夫妻关系失衡往往会传导至亲子层面[3]。二是关注亲子关系对儿童发展的后果:孙霁等发现不良亲子关系会增加青少年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及自伤、自杀风险,良好亲子关系则能减少问题行为[4]。这些研究揭示了亲子关系的前因后果,但考察对象大多集中于一般城市家庭或农村留守儿童,针对随迁农民工家庭这一特定情境的探讨仍较有限。

1.2.2. 随迁及流动儿童家庭的相关研究

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凸显,随迁子女及其家庭逐渐进入学界视野。研究者注意到,随迁家庭身处城乡过渡地带,既承受城市文化的冲击,又保留乡村传统的惯性,家庭生态处于持续的调适之中。姚进忠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分析了农民工子女的城市社会适应问题,指出应从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多层系统发掘和调动资源,共同促进社会适应[5]。相关研究还表明,随迁子女在教育融入、心理适应、社会交往等方面面临区别于城市儿童与留守儿童的独特困境,家庭在其中既可能是风险的来源,也可能成为保护性因素的载体。这些成果为理解随迁家庭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地图,但多侧重于子女的适应与发展议题,对家庭内部亲子关系这一子系统内部的冲突机制关注不多。

1.2.3. 社会工作介入家庭与亲子关系的研究

社会工作学科在家庭服务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介入经验。牟小林基于亲子沟通层次模型建构了亲子平行小组干预模式,从意识与行为两个层面促进流动儿童与父母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技巧,为改善流动儿童亲子关系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6]。梁艳丽系统论述了社工介入家庭亲子冲突调解的优势与方法,指出社工可借助系统理论引导亲子双方从家庭系统出发认知冲突成因,并运用结构性家庭治疗等方法推动亲子关系修复[7]。这些研究展示了社会工作介入亲子关系问题的专业能力,但也反映出两点不足:一是介入实践多聚焦于具体方法或个案成效,理论建构层面的贡献相对薄弱;二是专门针对随迁农民工家庭亲子冲突、且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整体框架的系统研究仍较为少见。

从现有研究看,流动人口家庭与亲子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均有积累。国外移民家庭研究围绕代际文化适应落差、父母工作压力与亲子沟通展开,发现父母与子女文化适应速度的不同步会加剧代际隔阂,并相应发展了文化敏感的跨系统家庭工作方法;国内研究多聚焦流动家庭亲子关系、随迁子女心理适应与社会融合,但视角集中于教育学与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科较少从整体生态理论出发作系统建构。与国外移民家庭研究相比,国内随迁家庭亲子冲突兼具迁移适应性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的特殊情境;与国内既有成果相比,本文以家庭生态理论为框架、以社会工作介入为落脚点,希望在跨系统解释与可操作介入之间建立联系,这构成了本文区别于既有研究、又与之对话的基本面向。

1.2.4. 研究述评与本文切入点

综观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在研究对象上,现有成果对城市家庭与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较为充分,而作为二者中间形态的随迁农民工家庭,亲子冲突问题尚未获得系统而深入的专门考察。第二,在分析框架上,多数研究从单一系统或单一变量切入,缺乏将家庭置于多层生态系统之中、考察其跨系统联动机制的整合性视角。

基于以上研究缺口,本文选取家庭生态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该理论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不仅提供了一套微观-中观-外层-宏观-时间的分层视角,更强调系统之间的耦合与动态传导,能够把随迁农民工家庭亲子冲突的多元成因纳入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框架之中。同时,该理论与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能够将冲突成因分析与介入框架建构贯通起来,避免就冲突谈冲突、就干预谈干预的割裂。本文即是在这一意义上,尝试为随迁农民工家庭亲子冲突研究提供一个兼具整合性与操作性的理论框架。

2.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核心概念

2.1.1. 随迁农民工家庭

农民工通常指户籍仍属农业户口、却在城镇从事非农劳动的人口群体,当该群体将子女带入城市共同生活时,便构成随迁农民工家庭。与留守家庭相比,随迁家庭实现了亲子陪伴形式上的连续性,但与城市原生家庭相比,他们的社会身份、资源占有与文化资本存在明显落差,因而成为介于城乡之间、易被忽视的弱势群体。

2.1.2.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即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缘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情感联结,是个体最早建立、最具基础性的人际关系,对儿童的个性养成、社会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儿童健康成长的基石,而失调的亲子关系则可能诱发心理与行为问题。

2.1.3. 亲子冲突

亲子冲突是亲子关系失调的一种显性状态,指父母与子女在观念、期望、行为规范与情感需求等方面因不一致而产生的对立、争执或紧张关系。本文将亲子冲突理解为亲子关系中因多系统因素耦合而集中爆发的、具有特定表现形态的互动失序,这一定位为后文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剖析其生成机制奠定了基础。

2.2. 理论基础: 家庭生态理论

家庭生态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于1979年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演化而来。布朗芬布伦纳于1979年在《人类发展生态学》中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主张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持续互动的结果,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多层环境系统之中[8]。该理论将家庭视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生态系统,认为家庭的发展并非取决于单一因素,而是内部成员互动与外部多层环境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布朗芬布伦纳将家庭所处的环境划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层系统与宏观系统四个相互关联的层级,并进一步强调时间系统对家庭发展的动态影响。

微观系统指个体直接参与并与之互动的即时环境,包括亲子互动、夫妻关系、教养方式等,是亲子冲突发生的直接场所;中观系统指家庭与学校、社区、同辈群体等微观系统之间的关联,互动质量决定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强弱;外层系统指个体不直接参与却产生间接影响的环境,如父母的工作环境

利政策；宏观系统是影响个体发展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与制度政策等最高层级环境；时间系统则呈现上述各系统随时间演化的动态过程，涵盖家庭迁移时长、子女成长阶段、社会政策变迁等。

这一理论对本文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提供多层级、系统化的解释框架，提示研究者亲子冲突是多层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不能仅聚焦家庭内部；另一方面，它与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姚进忠对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的分析即表明，改善该群体处境需从家庭、学校、社区等多层面协同调动资源[5]，这为建构多层级介入框架提供了直接支撑。需要指出的是，家庭生态理论的核心不在于对系统的分层列举，而在于揭示系统之间的联结与动态传导，本文以此作为贯穿全文的分析主线。

本文之所以选取家庭生态理论，是因为它相对其他家庭理论具有独特优势。相较于家庭系统论，后者擅长描述家庭内部的互动规则与结构边界，视野却主要局限于家庭这一闭合系统，对外部环境约束的关注有限；家庭生态理论则把家庭置于多层环境之中，能同时解释家庭内部互动与外部结构压力，契合随迁家庭亲子冲突内因外扰、内外交织的特质。相较于家庭压力理论，后者以压力事件为起点，关注家庭应对资源与调适过程，却难以揭示冲突背后层层叠加的结构性根源；家庭生态理论强调的系统联结与时间动态，则能呈现压力从宏观、外层向微观传导的历时过程。相较之下，家庭生态理论更强调人在情境中，与社会工作理念具有高度契合性，能把成因分析与介入策略贯通于同一框架。正是基于这一比较，本文认为家庭生态理论为剖析随迁家庭亲子冲突、建构多层级介入框架提供了更为恰切的理论透镜。

3. 随迁农民工家庭亲子冲突的表现形态与生态成因

3.1. 亲子冲突的表现形态

随迁农民工家庭的亲子冲突并非无差别的紧张关系，而是在特定生存情境下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类型化形态。归纳既有研究与实务观察，可将其主要概括为沟通失调型与情感疏离型两类，二者虽在表现上各有侧重，却常常相互交织、彼此强化。

3.1.1. 沟通失调型冲突

沟通失调是随迁农民工家庭亲子冲突中最为常见、也最易被察觉的形态。该形态突出表征在于亲子沟通的内容、方式与频次同时出现问题。从内容看，父母往往将关注焦点过度集中于子女的学业成绩与行为规范，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朴素期待取代对子女内心情感需求的共情，导致沟通话题高度单一。现有调查显示，随迁家庭亲子沟通的内容长期局限于学业与日常事务，极少关注子女的情感与心理状态[5]。从方式看，父母多沿用说教式、命令式的表达，以一种权威姿态要求子女无条件接受自身观点，缺乏双向互动。曹瑞基于全国范围的调查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越低，与子女沟通频率越低，且越倾向于采用命令式而非说服式的方式[2]；随迁农民工父母普遍受教育程度有限，这一特征在其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子女在沟通中的主动性因此被持续压抑，久而久之从不愿说转向无法说。从频次看，随迁农民工父母普遍从事长工时、高强度的劳动密集型工作，每日可与子女有效相处的时间极为有限，客观上为沟通设置了物理屏障。有研究将流动家庭这一状态概括为父母的高要求与亲子的低互动之间的矛盾，指出共同活动少、有效沟通时间短是流动家庭亲子关系的共性问题[9]。

以笔者接触到的家庭为例(已作匿名处理)，A家庭来自中部某省农村，父亲在建筑工地务工，母亲在制衣厂做流水线，两人每日工作时间均超过十小时。儿子小豪(化名)就读于当地一所公立初中，周一至周五在校寄宿。因长期难以见面，父母与孩子的交流几乎全部集中在作业写完没有，考试考了多少分这类问题上，且多采用命令与训斥的语气。一次期中考试，小浩成绩略有下滑，父亲知晓后厉声斥责“供你读书不容易，你就考成这样”，小浩欲解释却屡被打断，最终摔门而出。表面看这是成绩引发的争吵，实则是父母高强度工作挤压了沟通时间、单一的话题内容堵塞了情感表达、权威式的表达方式压抑了子女

主动性，三重因素在同一场景中叠加，才使一次平常的成绩波动升级为激烈冲突。

3.1.2. 情感疏离型冲突

情感疏离是随迁家庭亲子关系中一种更为隐蔽、也更具侵蚀性的冲突形态。它不像沟通冲突那样表现为显性的争执，而是体现为亲子间情感联结的松动与信任的流失。此类冲突的生成往往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父母因工作与生活压力无暇顾及子女的情感需求，难以及时察觉子女的心理变化；而随迁子女在城市中又常面临融入困难与同辈交往困难，内心的孤独感与自卑感缺乏有效的出口。当子女的情感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时，他们便倾向于在情感上远离父母，亲子关系由亲密走向疏离。相关研究对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分析同样表明，家庭情感支持的缺位会经由亲子互动质量的中介作用，转化为子女的心理适应困难与情感疏离，进而削弱其寻求亲子联结的内在意愿[10]。

另一家庭(已作匿名处理)中，B家庭女儿小云(化名)随父母迁入城市后，因口音与家庭经济条件在同辈中显得与众不同，逐渐变得沉默寡言。父母均忙于夜市摊贩营生，深夜才归，对女儿的变化几乎无察觉。小雨多次想向母亲倾诉在学校的委屈，却总被“妈还要忙，你自己要学会适应”打断。久而久之，她不再愿意主动开口，放学回家便关进房间，亲子之间由无话可说转向无话愿说。当父母终于察觉异常、试图追问时，女儿以激烈的方式爆发，长期的压抑与疏离在那一刻集中显现。这一案例呈现的，正是情感需求长期得不到回应所导致的联结松动，以及由此累积、最终以冲突形式释放的过程。

3.2. 亲子冲突的生态成因剖析

以家庭生态理论观之，随迁农民工家庭亲子冲突的产生并非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微观、中观、外层、宏观四个系统相互作用、层层传导的产物。以下依系统层级逐层剖析，并特别关注各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

3.2.1. 微观系统：家庭内部互动的失衡

微观系统是亲子冲突发生的直接场域，前述沟通方式与教养方式的问题即在此层面集中显现。此外，夫妻关系的紧张同样会加剧亲子冲突：部分父母将生活压力下的不满情绪转嫁于子女，或在教育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使子女陷入两难处境，进一步破坏家庭的情感氛围。

3.2.2. 中观系统：家庭与外部系统的衔接不畅

中观系统作为连接家庭与外部环境的纽带，系统间的互动质量直接影响家庭能否获得有效支持。在家校互动上，部分城市学校对随迁子女存在刻板印象，家校沟通又局限于学业成绩的反馈，加之父母工作繁忙、难以参与家长会，教育合力难以形成，子女出现问题时父母与学校容易相互指责、将矛盾转嫁至亲子之间。在社区融入上，针对随迁家庭的亲子服务项目相对匮乏，本地居民与随迁家庭之间又存在隔阂，使家庭难以建立起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面临亲子冲突时往往只能独自应对。

3.2.3. 外层系统：环境压力的间接传导

外层系统不直接介入亲子互动，却通过影响父母的工作状态、经济收入与生活压力，间接塑造亲子关系的质量。随迁父母大多从事劳动强度大、薪酬低的密集型工作，长期累积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带入家庭后往往表现为对子女缺乏耐心，一件小事即可能引爆冲突；过长的工作时间又挤占了亲子相处时间，加剧情感疏离。此外，随迁家庭离开农村后原有亲友支持网络被打破，在城市又难以迅速重建，面对冲突时缺乏有效援助，问题得不到及时化解，冲突便不断累积。

3.2.4. 宏观系统：深层结构因素的制约

宏观系统中的城乡发展差异、社会分层与文化差异，构成了随迁家庭亲子冲突产生的深层土壤。城

乡发展差异使随迁家庭虽已进入城市，却因户籍差异的限制而难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与待遇，承受明显的社会融入困难，父母由此产生自卑感与无力感，往往将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于子女学业，形成过高的教育期望，引发期望冲突。与此同时，城乡文化差异也在家庭内部制造价值观念的裂痕：父母强调节俭、顺从与集体意识，子女则更崇尚个性、自由与自我表达，两代人的分歧使父母认为子女偏离传统、子女认为父母思想陈旧，双方难以相互理解，冲突由此而生。

上述四个系统并非各自孤立地作用于家庭，而是循着可辨识的路径层层传导。以入学门槛为例：在宏观系统，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使随迁子女进入优质学校面临更多条件限制，父母由此产生只有考上好学校才能改变命运的焦虑预期；这一预期传导至外层系统，表现为父母主动延长工时、承接更繁重劳动以换取子女就学所需的额外支出；工作压力进入微观系统后，转化为父母情绪上的急躁与教养上的严苛，陪伴时间被挤占，命令式督促取代了平等交流；而当子女成绩未达期待时，中观系统中家校沟通的缺失又使父母难以获得客观反馈，只能把焦虑单向倾泻于子女。因此，一个源于宏观层面的结构压力，经外层、微观与中观层层传递，最终转化为亲子间的具体冲突。由此可见，随迁家庭亲子冲突频发、难解的格局，正是多系统在互动中相互放大、层层传导的结果。

4. 家庭生态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框架建构

基于上述成因分析，随迁农民工家庭亲子冲突既然是多系统交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工作的介入便不能局限于家庭内部，而应构建一个覆盖多层系统、兼顾时间维度的整体性介入框架。据此，本文提出“微观家庭赋能－中观系统联动－外层资源链接－宏观环境优化－时间维度跟进”的五层介入框架。

在具体实施这一框架之前，社工还需完成两个必备的前置性工作。一是家庭需求评估，即借助家访、访谈与量表筛查，综合考察亲子冲突的类型、强度与频次、家庭所处迁移阶段、子女年龄与心理状况及可动员资源，形成对每个家庭需求的个性化判断。二是确定干预优先级：对冲突已显性化、存在行为或心理风险的家庭，优先安排危机介入与个案跟进；对尚处潜伏状态但存在高危因素的家庭，以预防性服务为主；对整体功能良好的家庭，则以巩固性服务相衔接。只有先评估后介入、先分级后施策，五层框架才能在资源有限条件下发挥最大效用。

4.1. 微观系统介入：聚焦家庭内部，提升亲子互动质量

微观系统介入是框架的起点，目标在于修复家庭内部的互动失衡。社工可综合运用个案与小组工作，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开展亲子沟通辅导，教授倾听、表达、换位思考等技巧，推动沟通由单向说教转向双向互动；第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帮助父母辨析专制型、放任型与民主型教养方式的差异，调整过高的学业期望，辅以情绪管理辅导；第三，开展夫妻关系辅导，帮助夫妻认识到夫妻关系对亲子关系的传导作用，营造稳定的家庭情感氛围。

在具体操作上，微观系统介入应遵循先关系、后问题的顺序，避免一上来就针对子女的学业或行为问题施压。社工先通过家庭访谈了解家庭互动模式与沟通习惯，识别冲突发生的触发情境与高频议题，再据此设计针对性干预。以沟通失调型冲突为例，社工可运用亲子平行小组，将父母与子女置于并行的成长轨道，分别训练父母的倾听与共情能力、子女的自我表达与情绪管理能力，再通过亲子共同参与的互动环节实现双向练习，使沟通技巧的习得从认知层面落实到行为层面。以情感疏离型冲突为例，则采取家庭系统的整体介入，借助家庭雕塑、角色互换等技术帮助家庭成员看见彼此未被表达的情感需求，重建情感联结。同时，介入应充分尊重家庭的迁移处境与文化背景，避免以城市中产家庭的教养标准直接套用于随迁家庭，而是从家庭既有的资源与优势出发，寻找可改变、可持续的切入点。需要强调的是，微观介入虽聚焦家庭内部，却不应陷入就家庭谈家庭的封闭式干预，而应时刻保持对中观、外层系统因

素的敏感，将家庭内部难以化解的困境及时转介或联动到相应的系统层面。

4.2. 中观系统介入：推动系统联动，构建多元支持网络

中观系统介入的目标在于打通家庭与学校、社区之间的衔接，为化解亲子冲突提供外部支持。在家校互动方面，社工可搭建家校合作平台，推动学校消解对随迁子女的刻板印象，帮助父母掌握与学校沟通的技巧、积极参与家校活动，形成教育合力。在社区支持方面，可依托社区平台设立亲子服务中心，开展亲子沟通辅导与家庭教育培训，组织志愿者提供学业辅导、陪伴支持，并通过社区融合活动促进随迁家庭与本地居民的互动，使家庭在面临冲突时不再孤立无援，而能从中汲取支持资源。

在推动系统联动这一层面上，介入不应停留在原则性倡导上，而应落到可执行的行动步骤。以家校社三方协调会议为例，社工可按以下流程实施：先梳理存在亲子冲突风险的重点家庭名单，向班主任核实子女在校表现，据此确定议题并邀请家长、班主任与社区工作人员参会；会议不直接聚焦孩子的问题，而是由三方各自陈述观察到的现象，再由社工引导把现象归因到沟通方式、时间分配与支持资源等系统因素上，避免把责任单方面归于家庭或学校；随后围绕家庭、学校、社区各能做什么商定具体措施，明确责任人与时间节点，形成书面跟进备忘；最后按约定周期回访，评估措施落实与亲子关系变化，决定是否调整方案或转介专业资源。通过这一可复制流程，系统联动才从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实务机制。

4.3. 外层系统介入：链接外部资源，缓解家庭环境压力

外层系统虽然不直接介入亲子互动，却可以通过父母的工作状态、经济收入与生活压力，间接塑造亲子关系的质量，因而构成化解亲子冲突的间接而关键的着力点。基于上文的成因分析，随迁家庭亲子冲突的外层根源，在于父母长工时低薪酬的劳动处境、原有亲友支持网络的断裂，以及由此累积的负面情绪向家庭内部的转嫁。因此，社工的外层介入不能仅仅局限于就业帮扶这一维度上，而应形成对家庭生存处境的全方位回应：第一，在就业与劳动权益维度上，社工可与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合作，为随迁父母链接工作环境更优、工时更规范的就业机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并主动介入工资拖欠、超时加班、劳动保护不足等具体问题，协助其合法维权，减少劳动权益受损带来的情绪损耗；第二，在生活保障维度上，围绕住房、就医、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现实需求发挥资源转介功能，将家庭与相应的政策资源、公共服务对接，降低家庭在城市立足的制度性成本，使父母从繁重的生存焦虑中部分解脱，为亲子相处留出时间与心力。

社会支持网络维度则是外层介入的重要抓手。针对随迁家庭原有地缘、亲缘支持网络断裂的困境，社会工作者可帮助其在城市重建支持网络，如引导参与社区活动、组建互助小组、链接志愿服务等，使家庭在面临亲子冲突时能够获得外部支持而非独自承受。需要指出的是，外层介入不能由社工单方包办，而应注重培养家庭自身的资源获取与问题解决能力，使外部资源的链接最终转化为家庭可持续的应对能力，真正切断工作压力－情绪转嫁－亲子冲突的传导链条。

4.4. 宏观系统介入：开展社会倡导，优化整体社会环境

宏观系统介入针对的是亲子冲突的深层结构性根源。社工可通过调研形成政策建议，向政府部门反映随迁家庭的需求，倡导改革户籍管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消解城乡发展差异对随迁家庭的排斥。同时，社工可借助媒体与社区宣传，消除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呈现随迁家庭积极正面的形象，并推动城乡文化交流，减少文化差异所引发的代际冲突。在这一层面，社工主要扮演倡导者与政策影响者的角色，其专业依据在于社会工作的社会正义价值取向。

为使宏观倡导不至于停留在呼吁这一纸面层面上，社工可将其转化为若干具体路径：第一，依托一

线服务积累的个案与数据，围绕随迁家庭在子女教育、公共文化服务、劳动保障等方面的共性诉求撰写专项政策报告，提交相关职能部门；第二，建立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沟通渠道，借助其议案、建议与提案机制，推动随迁家庭亲子关系问题进入公共议事日程；第三，依托媒体与社区开展公共倡导，既客观呈现其现实处境，也传递其积极适应的正面形象，消解刻板印象。这些路径的共同指向，是把社会工作“倡导公正”的专业立场转化为对制度环境的渐进性优化。

4.5. 时间维度介入：把握发展阶段，实施动态跟进

家庭生态理论所强调的时间系统，介入还应具备动态性。时间系统的内涵不仅在于子女随年龄增长而带来的生命历程变化，也包括家庭迁移阶段与社会政策环境的历时变迁，二者共同塑造着亲子关系的阶段性样态。随迁家庭的亲子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迁移时长与子女成长阶段不断演化：初入城市时，家庭主要面临环境适应与关系震荡；在城市立足之后，冲突往往转向教育期望与教养方式的磨合；而当子女进入青春期，独立意识增强与学业竞争加剧，又会引发新的代际张力。

因此，介入框架应在时间维度上作出分段安排。在随迁初期，社会工作者应重点帮助家庭适应新环境，缓解迁移带来的关系震荡，通过陪伴与支持帮助家庭重建稳定的生活秩序；在稳定期，着力于巩固亲子沟通成果、预防冲突复发，引导家庭将习得的沟通技巧内化为日常互动方式；而在子女进入青春期等关键阶段，则需特别关注亲子关系的阶段性张力，及时调整介入策略，由单纯的沟通训练转向对子女自主性的尊重与边界协商。更重要的是，时间维度的介入意味着社工不能以一次性、项目化的服务了结个案，而应建立持续的跟进与回访机制，依据家庭所处的迁移阶段与子女成长节点动态评估需求、滚动调整介入目标。这一时间维度的介入，弥补了以往静态介入的不足，使整个框架更具动态适应性与可持续性。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家庭生态理论为分析框架，围绕随迁农民工家庭亲子冲突“呈现何种形态、因何生成、如何介入”三个递进问题展开分析，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在表现形态上，随迁农民工家庭的亲子冲突并非无差别的紧张关系，而是在特定生存情境下形成的类型化样态，可类分为沟通失调型与情感疏离型两类。前者以沟通内容单一化、方式说教化、频次低频化为表征，是父母高强度工作、有限教育背景与子女情感需求之间结构性矛盾的显性化；后者则表现为亲子情感联结的松动与信任的流失，具有隐蔽性与侵蚀性，往往是子女情感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后以冲突形式集中释放的结果。两类形态并非截然分立，而是在具体家庭中常常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形塑随迁家庭亲子关系失调的复合格局。

第二，在生成机制上，随迁家庭亲子冲突是微观、中观、外层、宏观四层系统相互传导、相互影响的产物。微观系统中家庭内部互动失衡构成冲突发生的直接场域；中观系统家校衔接不畅、社区支持薄弱使家庭缺乏缓冲资源；外层系统父母工作压力与支持网络断裂经由情绪转嫁间接侵蚀亲子关系；宏观系统城乡发展差异、户籍差异与文化差异则提供了深层结构性土壤。尤为关键的是，上述系统并非各自孤立，而是循着“宏观结构压力－外层环境传导－微观互动失衡－中观反馈缺失”的可辨识路径层层放大，一个源于宏观层面的结构约束，最终可能转化为亲子之间的具体冲突。这一发现意味着，任何仅针对家庭内部或单一系统的干预，都难以从根本上化解冲突。

第三，在介入路径上，基于上述机制认识，本文建构了“微观家庭赋能－中观系统联动－外层资源链接－宏观环境优化－时间维度跟进”的五层介入框架。该框架的核心在于，让每一层级的介入都对应

特定层级的成因,并以前置性的家庭需求评估与干预优先级确定为实施前提,从而将成因分析、介入策略与操作流程贯通于同一理论框架之中。

5.2.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将家庭生态理论的系统互动与时间动态命题引入随迁家庭亲子冲突研究,突破了以往多从单一系统或单一变量切入的分析惯性,把分散于家庭、学校、社区、制度各层面的影响因素纳入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框架,为理解随迁家庭亲子冲突提供了一个更具整合性的理论透镜。第二,在解释逻辑上,本文不仅停留于对系统层级的静态列举,更着力揭示各系统之间的嵌合与动态传导机制,呈现了结构压力如何经由层层传递最终转化为家庭内部冲突的历时过程,跨系统传导的分析较之单纯的成因罗列更具解释力。第三,在学科立场上,本文将家庭生态理论与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核心理念相贯通,成因分析与介入策略共享同一套理论语言,避免了就冲突谈冲突、就干预谈干预的割裂,为后续实证研究与实务干预提供了兼具整合性与可操作性的分析介入框架。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属于理论思辨型研究,主要运用文本分析与理论演绎的方法展开分析,缺乏基于一手经验材料的实证检验,这使得文中所建构的介入框架在具体操作性上仍有待实践验证。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度访谈、个案跟踪或小组干预等质性、量化方法,对随迁农民工家庭亲子冲突的生成机制与介入框架的实效进行经验层面的检验与修正。同时,随迁家庭内部存在较大异质性,其亲子冲突的具体样态可能因迁移时长、家庭结构、子女年龄等因素而有所不同,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关注这些差异,以深化对随迁家庭亲子关系问题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 人民日报, 2024-03-01(010).
- [2] 曹瑞.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亲子关系影响的研究[J]. 中国校外教育, 2011(6): 51.
- [3] 杨莉. 夫妻关系优于亲子关系[J]. 中华家教, 2014(3): 12.
- [4] 孙霁, 班永飞, 罗思亮. 初中生和父母感知的亲子关系与内化问题的关联[J]. 中国学校卫生, 2025, 46(8): 1130-1133, 1137.
- [5] 姚进忠. 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探讨——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6(1): 22-27.
- [6] 牟小林. 平行小组在改善流动儿童亲子关系中的运用[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2015.
- [7] 梁艳丽. 社工介入家庭亲子冲突调解的优势与方法[J]. 社会与公益, 2020(7): 22-23.
- [8] 尤里·布朗芬布伦纳. 人类发展生态学[M]. 曾淑贤, 刘凯, 陈淑芳, 译. 心理出版社, 2010.
- [9] 朱妍, 刘志军. 城市流动家庭亲子关系改善的干预研究——基于内外影响力范式的动态视角[J]. 中国社会工作, 2024(16): 20-21.
- [10] 黄丹, 罗英廷. 社会资本、社会支持与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调查[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2, 22(1): 32-40.